

核心提示

今年三月,冯骥才先生度过他的八十大寿。那天中午,他和母亲一起吃了一顿面。“我母亲今年105岁。我觉得很难得,我80岁的人了,还能去看望自己的妈妈。”冯骥才一生游走于绘画、文学、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这四个领域,自己将其称为“四驾马车”。其中差不多有20年时间,他从文学界隐身,投入到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,如今由于年龄原因,冯先生已无法再为文化遗产保护而四方奔走,遂重返文学,成为“高产作家”。冯先生表示,重返文学并非放弃文化遗产保护事宜,他感慨,自己现在什么都不缺,“就缺时间”。



我喜欢在人生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上,
过得“深”一点

冯先生认为,每个人都有一些人生节点值得纪念,像生日、考上大学、毕业工作的日子,以及他所看重的结婚纪念日等等,“我喜欢在人生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上,过得‘深’一点。”那天,冯先生一是和105岁的母亲一起吃了顿面,另外则是在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办一个活动,讨论知识分子和他的故土,和故土上的人民,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。冯先生认为,追溯一个人精神来源的时候,一定离不开父母和家乡的影响。在冯先生看来,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不是几句话的事儿,“会影响到你的骨子里、精神上。我50岁的时候,在老家宁波办了一次画展,起名‘敬乡画展’,就是敬我的老乡,敬我的老家,那是我生命的发源地。”

也就是说,如果不是何泽慧和她的团队以“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”的精神加班苦干,中国的氢弹可能就要推迟两到三年才能试验成功。此外,何泽慧在研究宇宙射线方面也很有成就。可是对这一切,何泽慧从不提起,好像根本就没有这回事。她处世恬淡,从不在乎什么名誉、地位。在她眼里,名利甚至连一丝浮云都不如。她一心热爱的就是科研工作。1980年,她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,当时还称“学部委员”。在科学界,这是很高的荣誉。几年后,当北京一家报社的女记者问到她被选为院士的感受时,她却说:“我才不稀罕什么院士呢!”

作为一名女性,何泽慧不仅不爱打扮,甚至有

书房和画室在我家廊子的两头, 这是甜蜜的往返

继两年前推出《书房一世界》后,冯骥才的《画室一洞天》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。相比于其他作品,冯先生表示,这两本随笔集写得最为轻松,“我最近写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小说,所以写《书房一世界》和《画室一洞天》,也是为了放松自己。写起来很轻松,像那些宋人笔记一样,但是,我也比较注意语言,用一些白描的语言,非常简单不雕琢的,不刻意的语言来写,写出平淡生活里的一种韵味。”

书房和画室,是冯先生每天必呆的两个地方,里面的每个物件都和他朝夕相处,他说:“写作于我,更多是对社会的责任方式;绘画于我,更多是个人心灵的表达与抒发。”谈及绘画与写作是如何相互影响的,冯先生说自己最早的身份应该是画家,“我画了15年的画,绘画对于我更私人化一些,更多的是个人心灵和生活感受,是一种排遣,一种抒发。”至于文学,冯先生则认为“它更多地承担了一些社会责任,对生活的思考,还有和读者一起认识生活,这是我一些文学追求”。

冯先生笑说自己从来不为写作和绘画分配时间,“我的画室跟书房是在我家廊子上的两头,如果有文学创作的冲动,我就去书房,有的时候写着写着,会产生绘画的表达欲望,我会钻到画室里去,这是一个甜蜜的往返,我感觉很幸福。”

这辈子都跟文化遗产保护捆绑在一起, 永远不会松绑

因年龄原因,冯骥才先生无法再为文化遗产保护奔波于一线,但他说自己这辈子都跟文化遗产保护捆绑在一起,“这是永远不会松绑的,如果现在让我回到60岁有体力的时候,我还是会放下小说。文化遗产保护还有大量的问题,我现在仍然为不断出现的新问题,甚至于一些困境而感到焦虑,我还有大量的事情没有做。”

让冯先生高兴的是,他们的一个想法得到了国家的重视、支持,“我们建议要在高校里建立非遗学学科,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专业人士,这个学科的建立得到国家批准了,今年就开始招第一批非遗学的学生,所以,我在文化遗产保护这方面的工作可能会更深入。”

提及当年何以远离了文学,而投身到文化遗产保护中,冯先生说也有人跟他说,呼吁呐喊就可以了,为什么亲身要去做?“上世纪90年代时,这个城市里的肌理全在,忽然一个通知要拆老街,广告词还说‘将来你在这个地方,想不到是天津,而觉得是在香港的铜锣湾’,我一听就急了,到处找人,后来达成了协议,保留老街的几个

历史建筑。”此后,冯骥才去了一趟法国,想去看了解法国是如何保护巴黎的,结果在法国时,有人告诉他,天津最古老的商业街估衣街被拆了。冯先生匆匆从法国回来,第二天就到老街去看,“我一看老街被拆空了,历史建筑一旦被拆了就永远没办法了,重建,根本不是历史。”回忆至此,冯先生感谢某媒体的一篇报道,“当时我站在老街那儿就哭了,一个记者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《冯骥才哭老街》,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在场,这篇文章影响很大。”

为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,冯先生曾经卖画筹措经费。此前,冯先生曾提到“我人生接过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教育”,在他看来,教育也与文化遗产保护一脉相承,“如果说前20年,我主要做的是文化遗产抢救性的保护,我今天要做的就是科学保护。我们抢救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,如果没有保护标准,没有规范,没有专业的人才,我们仍然对它不放心。所以我们在大学必须开启非遗学学科的教育,必须将其纳入高等教育的体系里。”

和文学阔别了20年,有太多东西想写

如今重返文学后,冯骥才可谓高产作家,除了《俗世奇人》《书房一世界》等,今年随《画室一洞天》一起出版的还有《多瑙河峡谷》,这是冯先生五部中短篇小说新作结集。其中,《多瑙河峡谷》讲述一对青年男女的苦恋,叩问人生,探究命运;《枯井》记录人在濒临绝境之际倾诉的心灵隐秘,探讨忏悔主题;《跛脚猫》剖析电视台女主持人光鲜背后的复杂人生和情感世界;《木佛》以木佛自述为叙事视角,批判价值观扭曲的文物市场和鉴定界;《我是杰森》围绕主人公的失忆以及寻找记忆展开情节,结局出人意料。五个故事曲折跌宕,较之以往作品,在真切的现实中引入了梦幻、奇幻、奇遇等因素。

谈及小说创作,冯先生表示,虽然和文学阔别了20年,但是从写作的意义上,他始终未曾离开文学,“因为我热爱文学,我对文学的热情好像是天生的,我觉得对文学对艺术的热爱都是天性。当我有了对生活的热情的时候,必须要用文字表达,那就是搞文学的人的一种天性;当我必须要用笔墨用色彩去表达,那就是搞绘画的人的天性。我现在有了时间写作,很多东西一拥而来,甚至同时几个想法都会来,因为过去压抑的时间太多了,20年生活积累得太多了,看得太多了,认识得也太多了。”

在做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的时候,冯先生说他经常有文学的冲动,有文学的想象,他笑说,那时候看到自己同辈的作家或者年轻人出新书的时候,心里会有一点苦涩,“但是仅此而已,因为我知道我做文化遗产

抢救的事情太重要了,而且我必须做不可,我不能选择。”

现在回归文学,冯先生表示,和20年前写作不同的是,他觉得文学还应该有一个重要使命,“就是给文学留下审美形象,你对于时代的思考,对于生活的认识理解,包括哲思,都要通过审美的形象、氛围、意境去体现出来。”虽然有太多想写的素材,但冯先生说不管写什么,他坚持两点,一是想把文学写成一个艺术品,“所谓艺术品就是有审美价值”,二是语言,“我认为不管你写作的时候多么富有激情,或者是你的情感多么澎湃,但是小说的语言最后还应该是精当的,这特别重要,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。我写《俗世奇人》很快,但改了很多遍,我觉得语言还不行的时候,我不敢放手。”

冯先生认为人的丰富主要还是来自于精神,“我写作我知道,越贫穷的时候往往想象得越多,想象的空间越大,所以,我觉得这恐怕不仅是作家应该注意的问题,也是一个社会问题,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重物质的时代,往往容易轻视具有精神价值的生活。我觉得我们必须认识到精神的价值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。”

我希望再多一点时间, 因为我想干的事太多了

50岁的时候,冯先生画了一大片树,“已经入秋了,但是阳光透过,叶子都闪光,这是人生辉煌的一个时期,50岁的我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。我在60岁的时候画了一幅画叫《豪情依旧》,我画了一片大江的中流,一只船扬帆,那时候正好开始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,我需要一股力量,所以画了这么一幅画。”

冯先生还和夫人在每年结婚纪念日时一起作画,尽管热爱画画,但因为时间太少,冯先生只能挤占绘画这个个人爱好,“我身边的草稿本特别多,每个桌上都有。比如我写某个人物,脑子里有个感觉,我就会把它画出来。我现在就缺时间,我希望再多一点时间,因为我想干的事太多了。”

80岁了,为何还让自己如此忙碌,冯先生说答案就是“爱”。他笑说觉得自己的心理年龄是50岁到60岁之间。

相比之下,冯先生认为文化遗产抢救工作需要更理性的东西,“必须要让人认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,这个意义和价值不是个人的,是民族的,我们今天多保护一样东西,我们的后代就会多拥有一样东西。但是也离不开热爱,如果你不热爱自己的文化,你哪来的文化的自觉?如果你没有文化的自觉,你又哪来的文化的自信?只有自觉,才有自信,有很多理性的东西需要我们不断学习。”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 张嘉/文

纪实

何泽慧和她的团队以“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”的精神加班苦干,中国的氢弹可能就要推迟两到三年才能试验成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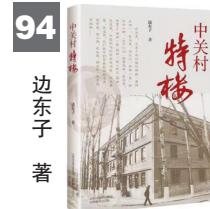
此外,何泽慧在研究宇宙射线方面也很有成就。可是对这一切,何泽慧从不提起,好像根本就没有这回事。她处世恬淡,从不在乎什么名誉、地位。在她眼里,名利甚至连一丝浮云都不如。她一心热爱的就是科研工作。1980年,她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,当时还称“学部委员”。在科学界,这是很高的荣誉。几年后,当北京一家报社的女记者问到她被选为院士的感受时,她却说:“我才不稀罕什么院士呢!”

作为一名女性,何泽慧不仅不爱打扮,甚至有

些不修边幅,她的志趣不在穿着打扮上。在家里,她经常穿着一件宽大的、褪了色的旧连衣裙,有些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,居里夫人的衣着。20世纪80年代,何泽慧和一些政协委员在视察途中,有一次登泰山的机会,和她一起登山的清华校友陈舜瑶至今仍记得:那天,何泽慧的“打扮”简直就是没有打扮,头发随意一挽,身穿旧衣服,俨然像一位道姑。的确,她那俭朴不俗的装束,加上那健步登山的身影,还真有点“仙风道骨”呢。

在何泽慧的身上,人们可以感受到老居里夫人把奖章给孩子当玩具的遗风。物质的富有,并不等于精神的富有;而精神的富有,也不一定以物质的富有表现出来。女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性是美好的,她们完全有权力、有理由表现自己的美好,但是美好的形象,不是靠刻意的修饰和过度的装扮,而应当是内在素养的外在表现。这就是何泽慧和许多女科学家给人们的启迪吧。

家风如何

人们说,钱三强领导下的核武器研制队伍是“满门忠烈”。

连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董一飞和十几名游击队员也换上了统一的冬装。大伙嘻嘻哈哈说笑着进了孙家大院。

院里的积雪已经铲起来堆在一边,有谁还在墙角里堆了个雪人,鼻子下贴着一撮胡子,活脱脱一个日本鬼子。屋顶上、

树上还覆盖着厚厚的雪。刘象庚听见他们回来,抄着手走过来,看见董一飞几个,点着头赞叹道:这才像个样子嘛。

张干丞从屋里出来,笑着说:“一飞,快把衣服拿过来,让刘老伯试一试。宝明呢?”

有人跑到前面喊着:“白宝明!白宝明!”

白宝明小跑着过来。

刘象庚摇着手说:“我一个半大老头子了,有这件棉袍子,够我过冬啦。”

张干丞说:“都做好了,刘老伯就不用客气了。”

还是白宝明年轻,三把两下就把新棉衣穿在身上,左右转一转,大伙齐声喝彩。

董一飞围着白宝明转一圈:“这傻小子,一换衣服也是个游击队员!”

另一个说:“这么俊气的小伙子还怕讨不上婆姨吗?只怕会被大姑娘小媳妇们抢了呢!大伙哈哈大笑。”

白宝明听着大伙的说笑,摸着头,满脸的幸福。

刘象庚也难得地露出笑脸:“宝明啊,我看你也年纪不小了,赶年底呢就给咱娶个婆姨回来,我们大伙也正好讨杯喜酒。”

这个一句,那个一句,大伙都很开心地笑着。这是难得轻松的时候。

大伙一直忙着训练,神经时刻紧绷着,谁知道小鬼子什么时候打过来呢!真打过来,子弹又没长眼,说不定真的就见阎王爷了。

他们在那边说笑,这边刘象庚和张干丞说着话。

小说